

“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探析

张 凯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大跃进”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笔者从外部刺激因素、内部动力、思想原因以及毛泽东个人的原因四个方面，探析“大跃进”的原因，希望能从中汲取教训。

关键词：“大跃进”；历史成因；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42-02

1958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结果欲速则不达，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关于“大跃进”的发动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一、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赶超”思潮是“大跃进”发动的外部诱因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国家基本上都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逐渐走上经济发展时期，但是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持不下。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无时不希望颠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安全就不能认为有充分的保证^[1]。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对我们党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广泛的“赶超”思潮。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要争取“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10月、11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64个国家共产党负责人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我国也提出了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接着，社会主义各国掀起了“赶超”热潮。1958年朝鲜劳动党发动了“千里马运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大”号召“迅速发展生产力，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一种“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跃进思潮，这给中国共产党也带来压力，而此时，中苏两党关系正处于非正常化阶段，毛泽东倍感压力，他在同西方国家开展竞赛的同时也开展同苏联的竞赛^[2]。毛

泽东也轻率地提出赶超思想，他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六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3]。随后，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大跃进”就在这种赶超思潮的外部刺激下轻率地发动了。可见，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普遍存在的“赶超”思潮诱发大跃进的产生。

二、摆脱苏联模式，急于改变国内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大跃进”形成的内部动力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客观地选择苏联模式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经过民主革命的中国一穷二白，底子薄人口多，急需发展以巩固新生的政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两国情况又相似，苏联模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确是当年中国一种最现实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面也形成了我国经济过分依赖苏联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同时，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断膨胀，并想利用我国经济上的弱点，从军事上控制我们，这对从战争年代中走过来具有深切体验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不得不开始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免受制于人。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经济建设的独立性问题，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工业化道路的标志。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

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寻找中国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

三、党内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左”倾思想是“大跃进”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

新中国建设取得骄人的成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建立,于是党内逐渐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逐渐地产生了“左”倾思想。从1957年开始,随着国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把当时对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批评或纠正经济工作中确已存在的急躁冒进偏向的做法,说成是“右”倾,“促退”,当作“右派进攻”。这给广大干部群众造成很大压力,党内外普遍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政治心理。

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了,影响了今年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标志着党内开始产生了偏离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党全面地肯定了反右派斗争,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背弃了八大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宣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这次会议以后,随着对1956年的反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错误的批判,党内在经济建设上的“左”倾指导思想膨胀起来。在1958年1月举行的党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十分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正确方针。他说,反冒进给群众拨了冷水,泄了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反冒进使右派钻了我们的空子,右派进攻把一些同志搞到了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地方了。在批评了反冒进的所谓右倾保守以后,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代替了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广泛存在着“左”倾思潮,盲目的、无意识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自上而下都洋溢着热火朝天的气氛,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大部分群众似乎都被应接不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充满了意气风发的热情和干劲,这与党中央互相渲染,全社会上下干群都存在“左”倾思想,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土壤。

四、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强力推动者

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4]。毛泽东是当时的主要决策者,“大跃进”的产生与毛泽东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在毛泽东的身上有着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有着深邃的洞察力与异于常人的思维,有着无所畏惧的胆识魄力和冒险精神,更有永不服输的志气不甘人后的倔强,还有着诗人般浪漫主义情怀……这些让毛泽东充满了魅力。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屡建奇功,因此他有着崇

高的威望,他的成功也让他更加自信。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一向是迎难而上,出奇制胜,在他看来没有办不到的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定胜天。也就是这股豪情壮志,他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但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有个打不开的结,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后,戎马一生的毛泽东将其一贯的豪情壮志和自信应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跃进”,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

所谓“大跃进”就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其目标是要用15年或更短的时间赶上并超过英国,其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争取以尽量短的时间“赶英超美”。在具体部署上,要求1958年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在1957年的3 901亿斤的基础上提高到7 000亿斤。仅从数字指标上的追加,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雄心。

遗憾的是,当时党内还是有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反对冒进,但是毛泽东的威望使得他在党内处于绝对的主导和权威地位,造成“一言堂”的色彩,使领导体制蒙上个人专断“人治”的色彩。然而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又是在个人崇拜中建立起来的。自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后,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丰功伟绩不仅成了毛泽东功绩和能力的证明,更使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树立了神一般的伟大形象,党内的同志们也都是对他钦佩之至,心悦诚服。加之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崇拜权威在国民心里一直存在,这也使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当个人崇拜得以在党内盛行,便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领袖错误的能力。因此,当毛泽东同志振臂一呼,错误地发动“大跃进”时,全中国人民就开始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即使有人反对冒进,也无法力挽狂澜,理性力量在盲目的普遍的个人崇拜下已无法得到正视,这归根结底又是我们党内民主制度的缺乏。所以,毛泽东尽管是“大跃进”运动的强力推动者,但是真正酿成悲剧的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

总之,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再回过头去讨论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原因都已无力回天,但是史可鉴今。“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但却忽视了客观条件,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党领导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的保障。因此,科学地认识和阐释“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韩钢.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J].河北学刊,2008(4).
-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91.
- [3]杨奎松.“大跃进”成因再解析[J].老年教育,2008(12).

(责任编辑 陈雅莉)